



GU DIAN SHI CI MAN HUA

古典诗词漫话

骆玉明 著

纵放悲歌



中华书局

GU DIAN SHI CI MAN HUA

古 典 诗 词 漫 话

骆玉明 著 /

纵放悲歌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纵放悲歌/骆玉明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4
(古典诗词漫话)

ISBN 7-101-03988-X

I.纵… II.骆… III.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明代 IV.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9202 号

责任编辑:张 耕

古典诗词漫话

纵 放 悲 歌

骆玉明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32·7 印张·127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13.00 元

ISBN 7-101-03988-X/1·514

出版说明

《古典诗词漫话》是一套文化类普及读物，共 15 种，每种一个专题，它起自先秦的《诗经》，终于晚清的龚自珍，是有着一个大致的脉络的。

诗词是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骄傲，谈诗论词的专著、论文数不胜数。这套书所以采用漫话的形式，是为着读者接受的方便。每个时代的读者，理解自己时代的作品，除特殊情况外，大都不存在什么困难。而时代相隔，理解起来似乎就有些滞碍。时代距离愈远，理解起来困难也就愈大。理解的隔膜源自于生活的隔膜。

诗词也是如此。历史上桑间濮上的谣咏，文会燕集中的歌吟，都是新鲜生动、荡人情思的。但隔着百年乃至千年的时光，失却了读者与作品的直接交流，她的生气愈来愈微弱，影响也就越来越衰减。等到变成人人敬而远之的“古典”，她的天生丽质和勃勃生气已经被时间织就的蛛网遮盖住了。要恢复她的生气，就要拭去这层蛛网，使我们能直接面对她的本来面目，乐于和她做朋友。久而久之，就会从这位韵致高雅的朋友身上得到原来意想不到的好的影响。

像这样的工作，港台称之为“古典的现代化”；大陆原来

称为“鉴赏”，近年也逐渐袭用港台的说法。做这样的工作，高头讲章固不可废，但形式灵活、内容风趣生动的随笔似更相宜。本套丛书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用漫话的形式，将诗人的生命历程、作品的内涵与诗艺表现作为叙述重点，着重艺术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每一本都包括四五十篇短文，每篇处理一首诗，或一个特定事件。各篇分读可以体味作品的精华，合观则可得诗人的身世与人格。举凡诗人轶事，诗作赏析，均能深入浅出，雅俗兼顾。既是非常好的文化小品，也是学术小品，很适合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

这套书先在香港出版，原名“诗词坊”，香港中华书局的同人为使丛书更具吸引力，在版式和插图上动了不少脑筋。既而引入台湾地区，也大受欢迎，在学林颇获好评。现在，蒙作者及香港中华书局慨允，我们对原作略加修订，并保留了部分插图，重新出版。像这样的一套小丛书，能在两岸三地出版，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价值。

最后，向这套丛书的作者和香港中华书局同人表示谢意，也希望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今后把“古典的现代化”工作做得更好。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3年6月

目 录

明中叶江南才士(总论)·····	1
中国月亮照外国·····	6
人的卑琐与伟大·····	11
凝静之境·····	16
雄峻胜佳丽·····	20
人生须有梦·····	24
对儿子的期望·····	28
文豪做小官之苦·····	33
沉闷的人生·····	37
吴乡小景·····	42
心的遨游·····	46
面对女性的困惑·····	51
历史的深处·····	55
兴高采烈写市井·····	61
惆怅少年心·····	65

走向自由的文人	70
对侠义的向往	76
南朝诗风的重兴	80
桃花仙人	84
忍与不忍	89
唐伯虎与林黛玉	93
歌唱《莲花落》	98
贫贱者的高贵	102
生死之际	106
石湖清景	111
朋友之间	115
外力的驱迫	120
以美人写花的意趣	125
尴尬的功名	129
文士与渔父	134
诛心之论	138
雨·宋诗·文征明	144
刁悍尖湍之辞	148
长夜作鬼语	153
托物言志思奋飞	157
情意温绵忆旧人	162
颓放而倔强的艺术	167
人生未必求平安	174
随想诗	179
纵论古史说名分	184

古典诗词漫话

节妇的悲哀·····	189
多彩多情的世界·····	193
塞上和平曲·····	199
酒与诗画·····	204
老来慕童真·····	210

明中叶江南才士(总论)

本书谈论的对象为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这是从时代、地域、人群三方面划出的一个范围。不过,明中叶的江南地区,究竟出现了什么情况?所谓“才士”,又是何等样人呢?却须在欣赏他们的诗之前,先行加以探讨。

明中叶的江南城市,工商业之发达,经济、文化之繁荣,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时代,及同时代其他地区。唐寅有《阊门即事》诗,写苏州阊门景象,那是非常热闹:

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工商业发展起来,许多变化就跟着来了。本来,中国是一个以官僚为中心的等级社会。但是,商人聚集财富,往往比做官还要快,发了财,就难免摆阔气、撑门面,弄得派头比官老爷还要大。而且,金钱还直接侵蚀了国家的权力。像

《金瓶梅》里所写的西门庆，就是个大商人，他凭着万贯家财，从县衙门直打到太师府，一些低级官吏简直成了他的奴仆。这样，贵贱之分，难免有些混淆，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也被搞得混乱起来。

金钱大量集中在城市里，就要有花钱的场所。于是，商铺、妓院、赌场，酒楼、茶肆，纷纷建立，流光溢彩，在这里煽起奢靡放纵的风气。当然不会只是有钱的商人在这里享受，官员、士绅乃至普通的市民，同样受到奢靡风气的浸染。这样，又造成对传统思想的破坏。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讲究礼义当然不错，但须知礼义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在旧礼义中，包涵着这样一些重要内容：一是教人服从，服从社会的思想权威，服从国家的政治权威，以及女子服从男性，小辈服从长辈；二是教人以安于贫困，切不可贪图富贵，追求享乐；三是教人把道德教条看得比性命还要高。特别是宋代的程朱理学，把这一套发展到极端。程颐说，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说，要“存天理，灭人欲”。明代立国以后，就以程朱理学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

其实，追求生命欲望的满足，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原本是人类社会中最根本、最活跃的动力。制定这样的“礼义”，其实质就是为了抑制人的欲望，抹杀个人的价值，防止因为利益竞争而产生动荡，以便维护社会统治秩序。至于统治集团本身，嘴上说的，自己并不照着做。这样，道德就变成虚伪的东西，人性在虚伪道德的压迫下，呈现扭曲的状态。而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追求

日益增长,必然对陈旧的道德教条提出疑问:为什么与生俱来的情欲、物欲成了莫大罪过;为什么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权利乃至生活权利?为什么可以做的事情不可说?

这些怀疑在一般民众中还只是直觉,在知识阶层中就成为理论的推究,由此形成新的社会思潮。这种新思潮的代表,起初是明中叶兴起于浙江、后来蔓延到全国的王阳明的“心学”,特别是王学的激进派如王畿等人的学说;到了明代晚期,再由充满异端色彩的李贽推向最高潮,后来随着李贽的被害而走向低落。其基本的内容,就是要求承认个人的尊严,尊重人的情感,肯定人的欲望,推倒禁锢人性的假道学。如果放到世界范围来看,明中后期正是西洋的文艺复兴时代,这种新思潮同文艺复兴确实有若干相似的地方。

明中叶时,江南城市在全国来说,经济最发达,思想最活跃,文学艺术也最早表现出新的趋势。其主要代表,就是人们通常称之为“才士”或“才子”的一批文士,最有名的,是苏州的祝允明(号枝山)、唐寅(字伯虎)、文征明(号衡山),以及绍兴的徐渭(字文长)。前三人是同时代的,又是好友,活动的时间略早,徐渭则是在他们死后才开始自己的文艺生涯。徐渭之后,就是晚明文学兴起了。他们四人的诗,就是本书主要的谈论对象。当然,所谓“江南才士”不止于这几位,但笔者希望稍微集中讨论,以见出各人的基本面貌。

说起这几位文士,人们很容易想起许多传说故事来。诸如祝枝山题对联、唐伯虎点秋香、徐文长断案之类,都是很有趣的。但那是民间的创作,故事中人物同真实的历史人物,并不是一回事。只是,老百姓把他们编到自己的故事

里,改造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却又同他们本来的个性、行为有关系。后文在需要和方便的时候,将会谈到两者之间的关系。

这一群江南才士,具有什么样的共同点,可以构成一个群体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都很有才华。这几位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而且在其他领域都有出色的成就。祝、文、徐都是书法名家;唐、徐是绘画史上开一代风气的人物;徐渭的戏曲,代表了明代戏曲史的重大转折,祝允明对此也有相当的造诣。

他们的成就,不仅出于天赋,也出于思想的敏锐。祝允明跟王阳明(守仁)是同时代人,他并没有直接受到王学的影响,却是明代最早公开反对程朱理学的人物之一。他的《祝子罪知录》,具有明显的异端倾向。徐渭与王学激进派王畿有密切交往,他的许多文章,对旧的道德传统展开了有力抨击。唐寅、文征明虽不曾写下专门的论著,却有共同的思想倾向。他们在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首先参与了这一过程,是时代的先行者。文学艺术正反映着他们对新的人生的追求。

特立杰出之士,常不能为俗夫庸众所容。这四人在政治上都是不顺利的。祝允明、文征明晚年做过短时期的小官,均因不能适应而退出了,其余二人则未入仕途。由于人生道路的蹭蹬不平,亦由于思想、性格的不合,他们常常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文征明的为人比较温和,但也只是不外露而已,祝、唐、徐三人,均是狂傲不羁之士。他们以强烈

的个性精神,与社会势力对抗,追求自由的生活,甚至有意蔑视社会生活的规范。因此,以常人的眼光看来,他们都有些畸形变态。例如,徐渭临终前给自己编的年谱,就叫作《畸谱》。

然而,在明中叶社会新思潮兴起的同时,旧势力仍然非常强大。愈是个性特异、才华出众的人,愈是容易感受到环境的压迫,好像触处是墙,生命总不能自由舒展。而且,整个明代,包括最激进的李贽在内,也没有出现从根本上否定旧制度、提出全新的社会设想的思想家,没有人看到完全不同于现状的前景。因而,不但社会中存在新旧的对立,先行者个人的灵魂里,也存在这样的对立。他们好像蚕蛹已经蜕化成蛾子,却面对结得过于厚实、无法咬破的蚕茧,兴奋、焦躁,而又绝望。由此,悲哀之情自然由心而生,并涌发为文艺层面上的波澜。

回到本书的主题:纵放与悲哀之歌。“纵放”是诗人自傲自负的性格和自由精神的显现,“悲哀”则是在社会的压抑和自我的矛盾中怅惘失路的产物。当然,这两者并不能包括他们的诗歌的全部,在以后的各篇中,也将谈及更广泛的内容,不会受到主题的限制。但是,可以说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因而也是恰当的谈论中心。

中国月亮照外国

祝允明的《关山月》是一首用乐府古题写作的诗，初读起来，好像面目陈旧，细细品味，却颇有新意：

明月度关山，中天照胡汉。十万良家子，嫖姚甲待旦。胡儿秋牧马，天子晓射雁。亦有王明君，独抱穹庐叹。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不像传统的边塞之作，完全站在单方的立场。它主要是写双方的军事对立，并通过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抒发对无穷尽战争的悲哀。诗的头两句，就有些异样。“明月度关山，中天照胡汉”，不论有意还是无意，都包涵了这样的意思：在中国之外，别有一个广大的世界。另一首乐府古题诗《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更明白地说：“汉月亦胡没”，可为佐证。原来，在祝允明的诗歌世界中，月亮虽从中国升起，却在异国落下去。简而言之，是中国月亮照外国。

读者也许就要问：何处来专属中国的月亮，知道月亮不仅照中国，也值得一提吗？这样反问是因为受了现代教育的关系。在重视“华夷之辨”，文化上持自我中心立场的古人看来，华夏以外的地方，都是没有文明的荒蛮之地，根本就不值得注意。所以，尽管他们不是不知道中国以外还有人群生活着，但在习用的语汇中，“天下”就是中国，中国的边缘，就是“天涯”了。至于月亮，在中国文学中有着浓厚的感情色彩，常常是客子与故乡、与思妇之间的媒介。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是典型的中国诗歌情调。诗人们不会想像它会照耀异邦。再说月宫里住着嫦娥、吴刚，他们跑到外国的天空上干什么？传统的边塞诗常写到月亮，即月亮已经到了边陲，却仍然只属于中国和中国人。陈后主《关山月》说：“秋月上中天，回照关城前”，显然是不想出关的样子。至于唐人沈佺期“汉月生辽海”，翁绶“徘徊汉月满边州”，更是明确贴上了专用标志。王昌龄的名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也隐隐有这样的意思。在这样的传统中，祝允明的诗显然有些异样。问题不在于是否知道月亮也照外国（这是前人也知道的），而是其中所透露出的某种世界意识。

这并非强拉硬扯。明以前的元朝，是个异族统治的、疆域极其广大的政权，与外界的交往十分频繁。明永乐时，中外交往仍然很多，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距祝允明出生只有半个世纪。跟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这使国人对异域的知识，不再那么空洞疏漠。从祝允明个人来说，他所作



祝允明

《前闻记》，专门记载了关于郑和航海的某些史实，又曾为黄勉之《西洋朝贡典录》作序，均可证明他对外部世界的兴趣。

另外，祝允明与日本人也有个人交往。钱谦益《列朝诗集》引沈润卿《吏隐录》说，日本使者来华朝贡，经过苏州，其中有一位名叫左省（系“省佐”之误）的僧人，曾特意拜访祝氏而未遇，与沈氏兄弟相逢。这位日本僧人不会说汉语，但懂汉文，能作笔谈。笔谈中说到他十年前就到过祝允明家。省佐还当场为沈氏作诗一首：

二月天和乍雪晴，见君似见祝先生。醉中不觉虚檐滴，吟作灯前细雨声。

在祝允明的文集中，则保存着有关的诗二首。一首题为《和日本僧省佐咏其国中源氏园白樱花》，一首题为《答日

本使》，下注“姓橘名省佐，相国寺僧”。诗如下：

日边来处几何时？闻说占申复到寅。遥仰北辰趋帝座，却经南甸驻行麾。诗名愧动鸡林客，禅谛欣参鹫岭师。回首山川浑渺邈，只有明月慰相思。

根据原注，第二句是指从日本航海来华，指南针在刻盘上方位的变化。第五句可以看出，当时祝允明在日本也有名声。末句的写法，同“汉月亦胡没”亦有些相似。

以上的事实，大约可以证明祝氏确实是一个对外部世界颇为关切、有所了解的人，《关山月》与传统边塞诗的差异，也确实存在微妙的心理背景。至少，他并不认为中国以外的世界毫无价值和意义，也不会认为“天下”就是中国。

但是，深入探究，就可以发现，明朝统治者以及士大夫（包括祝允明）那种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他们抛弃了对外界冷漠的态度，却只是停止在好奇以及宣声威于海外、令诸国朝贡所带来的满足。至于怎样更广泛、更深刻地了解世界，以致引入异族的文化来改进自身的文化，却是完全谈不上。祝氏《西洋朝贡典录序》说到郑和下西洋的意义，是“飞星舶于天池，耀皇华于鳌极”，这代表了当时人普遍的认识。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这恰是“中国月亮照外国”。

那么，中国以外的地方，又怎么样？祝允明所生活的15世纪后半期至16世纪初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达·芬奇、马基雅维利、马丁·路德、哥白尼、哥伦布，都是跟祝允明年代相仿的人物。欧洲历史正在酝酿着深刻的变